

近年来五四运动研究综述

许巍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 北京 100875)

摘要:为庆祝五四运动 90 周年,从 2008 年开始学术界掀起了五四运动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概括起来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五四内涵与精神的诠释;五四人物、群体、社团、刊物及思想的深挖掘;五四意义与作用的解读;五四争论与反思的再探讨。从以上四个方面出发对 1 年多来的五四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作一综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五四内涵;五四精神

中图分类号: D4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05(2010)03-0037-05

Abstract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in its study since 2008 and substantial results has also been yielded,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bout the May 4th Movement: interpretation of its spirit, a probe to the persons, community, magazines involves in it, interpretation of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a discussion to some related arguments.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Connot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2009年是五四运动 90 周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中央党研室、中央党校、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鲁迅博物馆、上海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相继召开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推动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1 年来出版专著、论文集十余部,发表文章近千篇。本文分四个方面作一综述。

一、五四内涵与精神的诠释

1. 对五四内涵的诠释

张宝明从近代中国历史面临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两大任务诠释五四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民主运动。”^[1]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对五四运动内涵切中实质的概括。

朱献贞从文化社会现代化的视野认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将“‘人的现代化’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确立的整体文化变革的思维。^[2]

左玉河对五四运动中的“个性主义”进行了深

入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并不是个人利己主义,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只有实现个人的解放才能建构真正的民主社会,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主义”对今天民主社会的建构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3]

郑师渠对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内涵作了重新解读,认为它包含了“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两大互相依存的思想取向。李大钊与梁启超代表两种“对西方求解放”的思想范式,都打破了新文化运动早期“奉西方为圭臬”的教条。“对西方求解放”这一诉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而理性保持“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搏击,对促进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仍是必要的。^[4]

郑师渠还探讨了新文化运动对现代性的反省,认为欧洲 19 世纪末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反省现代性的思潮深刻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经历了由“借重但不认同”到“借鉴与吸纳”,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向社会主义”的变化过程。陈独秀、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许巍(1985-),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李大钊等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借重、吸纳与超越,“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存在的极端功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的非理性倾向”,^[5]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除了传统描述的严厉、激进和不受妥协的一面外,还有宽容、人性化与更为多样化、生动的另一面。

许纪霖指出:除了爱国,五四运动还具有更复杂的内涵。他通过分析运动中两位重要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指出:五四运动还是一场“在公民责任的旗帜之下,从知识分子到全民动员的社会运动”。当时的政党政派、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尝到社会运动的甜头,从追求个性解放转向面对广大国民,用更宽广的人类意识和世界主义胸怀开始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造。这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涵。^[6]

2 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与弘扬

田克勤认为,在众多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中,爱国主义是最重要的一种,可以说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较之以往有其独特的特征,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开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新境界。^[7]

朱志敏将五四的理性精神归结为科学、民主、宽容,同时指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缺乏理性之根,即在纯粹理性层面对宇宙世界“逻各斯”即存在的逻辑缺乏全面系统考察的兴趣,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相关。认为当下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应当弘扬五四的理性精神,克服其缺陷,充分利用当今全球化世界提供的便利条件,全面审视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8]

莫志斌探讨了五四创新精神,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文化创新需要思想解放,重在提高民族文化竞争力,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文章无不透着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气息,其痛斥封建腐朽文化,热忱推介和研究西方新思想,是为提高民族文化的竞争力。^[9]石国亮指出:“五四青年的创新精神才是五四精神的精髓”,认为青年的特征、五四青年在运动中发挥的先锋队作用、五四运动的内涵和性质决定了五四精神中蕴含着创新精神。五四青年将这种精神积极用于实践,对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代更彰显着重要的价值。^[10]

倪邦文把五四精神与青年发展联系起来,指出五四精神及其特征对中国现代青年和青年运动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深刻挖掘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并将之转化为当代青年发展的精神力量”。^[11]

二、五四人物、群体、社团、刊物及思想的深挖掘

1 五四人物及思想研究

陈平原主编的《触摸历史》系列专著以“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为题,精选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曹汝霖、林纾等 45 个与五四密切相关的人物,“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来透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构成了一幅立体的五四运动的全景图”。^[12]

董德福、石云波认为五四人物研究是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进路,而在众多五四人物中,“胡适无疑是一位极具个性魅力且充满复杂性的问题人物”。他们以胡适为中心,选择陈独秀、钱玄同、罗素、泰戈尔、李大钊、梁漱溟,“从特殊的角度研究胡适与他们的复杂关系”,^[13]展现了五四文化人的一个新侧面。

王世儒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档案为据,考察了李大钊作为华法教育会及中法协进公会成员所做的工作,指出其“在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做出了无法磨灭的历史贡献”。^[14]金燕黎在充分肯定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奠基者同时指出,“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李大钊并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因此并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15]

欧阳哲生从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倡导广大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密切联系;积极反对孔教,力倡在道德、文学、政治各个领域开展革命,推动了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有意识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法俄型的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开辟做出了贡献。^[16]

刘军、严正指出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从“科学代替宗教”到“科学改造宗教”的变化。^[17]王凤青认为,陈独秀基督教观的转变,“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联,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受到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思潮、反孔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最终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确立了无神论宗教观。^[18]高力克认为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1 卷 6 号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反映了陈独秀“在反思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上所阐发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19]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张静如指出,研究五四应“扩展研究对象,加强对五四时期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当时很突出

但后来较一般的历史人物”。^[20]

李新宇指出高一涵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文和译作,对《新青年》杂志、对传播现代国家理念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有关个人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民主与自由等一系列关系和主权在民等现代国家理念的阐释和传播表明其“国家理念不仅与前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大不相同,而且比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和周密”,为《新青年》集团弥补了很多不足,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21]

朱志敏以高一涵对自觉心的论述为例,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作用,指出高一涵“从共和国家的性质、青年对国家的义务权利,以及青年修养内容原则等多方面阐述‘自主’和‘自觉’之义”,^[22]把青年启蒙的重点放在自由上,有现实意义。

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考察,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2 五四时期群体、社团、刊物的研究

牛宏宝将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与以罗素、杜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相比较,认为两者在言说问题的方式和进路上存在本质的差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自身言说的合法性的诉求中,更多的是归依于道德正当性和绝对综合的独断性”,而西方学者则被“求真的意志”所主宰,注重的是科学的逻辑性。由此推及 20 世纪中国的自身言说之所以长久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下,根本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身份没有实现从“牧师”向“立法者”的转变。这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将中国文化以新的方式说给世界听具有极大的反思意义。^[23]

岳谦厚认为五四青年学生从校园走向校外,积极干预政治,对中国政治进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大公报》的报道及评论为据,考察了五四运动前后学生与政府、军警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认为五四运动成了学生运动的分水岭,自五四后“学生运动成为民众社会运动的一部分”,^[24]这是五四学生发挥的重大作用之一。

秦昊扬指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创办三四百个社团,引进传播各种西方思潮,“用自己的笔与口、实践与热情为近代中国的巨大变迁奠定了底色与基座”。^[25]五四社团以学生为主体。其成功失败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经验借鉴。徐木兴以北京大学社团为个案,将其分为学术、探讨和宣传新思想、文艺

体育、社会实践等四类,通过分析这些社团的功能,认为它们凸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政治危机的回应”,^[26]对于中国最终走上现代化之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欧阳哲生整理了在美国新发现的一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参照已公布书信文献,从《新青年》前 6 卷之编辑、陈独秀赴沪后编辑办法之初议、自 8 卷 1 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陈独秀离沪后编辑办法之再议、陈独秀等对胡适与研究系关系之怀疑及最后成为中共理论刊物五个方面考察了《新青年》编辑演变的一段历史,^[27]订正了过去一些不够确切或似是而非的提法。

曹小娟认为《新社会》旬刊之所以在五四时期畅销是因为“宣传社会改造思想与方法以及对时下社会动态的敏锐把握”,^[28]而这恰巧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渴望改造社会的理念与追求。它的停刊,宣告了五四知识分子“文化”救国梦想的破碎。

刘人锋考察了《新妇女》的创刊经历、目的、主旨,指出它“批判封建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29]探寻使旧社会的妇女成为新社会妇女的方法与途径,开阔了时人的视野,促进了妇女解放。它提倡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结合,对当时乃至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五四意义与作用的解读

赵曜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大优良传统,即“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30]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霍海丹指出,“五四运动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探索了新的路径,举起了新的旗帜”;五四运动在危急存亡关头唤起了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催生了肩负反帝反封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31]

李蓉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和中共的历史和现实,都有密切的关系,而纪念五四也成为中共的光荣传统之一。^[32]沙健孙指出,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确实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33]

李东朗阐述了五四运动在促进民族觉醒方面的重大意义,指出运动通过“空前规模的抗争,强劲的爱国宣传,广泛地动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全国形成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提升了广大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责任意识”。^[34]齐卫平从促进人民群众主体意识觉醒、促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等方面阐述了五四在思想解放层面

的意义,指出其内涵“在民族遗产构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35]

王续添将五四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来考察,认为五四运动是这个转型过程中以经济、政治、文化为主的“节点”,即关键时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宣扬和建构民族主义,主要已不再是通过诠释历史,而是通过创造新文化,建构和形成新的民族认同,这也是五四运动凸显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时人“对民族理想即民族国家的重建”,已显露出欧美式和苏俄式两个模式趋向,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政治上的体现。^[36]

左玉河从新文化的建构方面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作用,认为在五四运动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体系被摧毁,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逐渐深化,可以说新文化建构“目标的确立、核心价值的转变及公开提出建立‘个性主义’的社会基础”,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37]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对史学的影响,以及对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的作用等。

四、五四争论与反思的再探讨

1 关于五四的争论

张静如认为五四运动并不能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引用刘少奇的报告认为1921年中共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他认为应实事求是的分析,“五四运动前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能够找到材料证明的除李大钊外,只有李达和张闻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确实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激进民主主义者”,^[38]1920年上半年才逐渐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他认为单纯界定为反动派是不对的,但说胡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对的。

冯天瑜对将五四运动界定为反帝反封建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封建一说源于陈独秀。指出“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39]然而陈独秀将封建一词泛化了,将其与前近代、落后等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模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真实内容。李新宇通过对相关史实和“五四反帝反封建”说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当时“无论是宣言、口号或通电、演讲,都未表现出‘反帝’或‘反列强’”,进而指出“‘封建’一词既不合中国古义,也不合西方原意,与

五四并不相符。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对此说法也多不认同”。^[40]

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陈平原认为五四是在“矛盾与斗争中‘断裂’传统,在‘对话’与‘交锋’中认知现代”;五四文化“从具体而微的‘文学形式’入手,逐渐推演到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41]实现了五四与传统的“成功断裂”。宋剑华反对这一说法,认为“五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中继站,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合理传承,将僵化的‘传统’变成了灵活的‘传统’”,^[42]五四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嬗变”,并没有出现断裂。资中筠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反的是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的制度,从文化上讲反的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43]并未与传统文化断裂。

2 对五四运动的省思

侯且岸以思想革命为切入点,分别谈了周作人和周策纵对五四的理解,指出两位先生都着重先通过思想的转变,再进行文学革命以致再造文明。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能把五四运动的本质意义深刻揭示出来,没有能把‘思想革命’和‘社会现代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也没有能真正搞清楚‘思想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基本关系”。^[44]他指出,这些问题都是今天我们纪念五四、缅怀五四精神所必须进行反思的问题。

许苏民主张“突破把‘五四’看作重大政治符号的先入之见,以人的平常心、学术的平常心来看‘五四’,努力做到价值中立”。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比较陈独秀、鲁迅等五四学者与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学者,考察五四知识分子的学术建树及局限性,指出:“无论西学还是中学,新文化人陈独秀、鲁迅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创造都无法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相比”,但是态度却异常激烈,缺乏“容忍不同之见、乐闻相反之论的雅量”,^[45]这种态度给20世纪中国历史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反思五四新文化人的学术及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文化建设,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

张耀杰考察了五四当事人关于以理性爱国还是依法爱国的争议,认为当今社会只有“自觉遵守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的依法爱国,才是现代公民既文明又理性的正当选择”。^[46]

总之,近1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前辈学者笔耕不辍,后辈学者积极思索,

使五四研究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已过去了 90 年, 一年年的纪念五四、回忆五四, 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五四内涵的解读、五四精神的弘扬、五四局限的反思对当今的思想解放、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相信在广大学者的努力下五四研究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张宝明. 回眸五四: 从“民族”与“民主”的视角[J]. 教学与研究, 2009, (5).

[2]朱献贞. 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3]左玉河. 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J]. 教学与研究, 2009, (5).

[4]郑师渠. 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J]. 近代史研究, 2009, (4).

[5]郑师渠. 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J]. 河北月刊, 2009, (1).

[6]许纪霖. 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J]. 学术月刊, 2009, (5).

[7]田克勤. 五四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 思想理论教育, 2009, (11).

[8]朱志敏. 弘扬“五四”理性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6);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性缺失[A]. 牛大勇, 欧阳哲生. 五四的历史和历史的五四[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莫志斌. 论五四文化创新精神[J]. 湖湘论坛, 2009 (3).

[10]石国亮. 五四青年的创新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9, (3).

[11]倪邦文. 五四精神与青年发展[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9, (3).

[12]陈平原, 夏晓虹. 触摸历史: 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董德福, 史云波. 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M]. 人民出版社, 2008.

[14]王世儒. 李大钊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J]. 北京党史, 2009, (6).

[15]金燕黎. 再论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11).

[16]欧阳哲生.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J]. 史学月刊, 2009, (5).

[17]刘军, 严正. 五四时期陈独秀基督教观述论[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0 (4).

[18]王凤青.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及原因分析[J]. 党史纵览, 2009 (8).

[19]高力克.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J]. 天津社会科学, 2009, (4).

[20]张静如. 深化五四时期历史研究[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6).

[21]李新宇. 高一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家理念[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22]朱志敏. 高一涵论自觉心——五四启蒙一例[J]. 北京党史, 2009 (3).

[23]牛宏宝.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J]. 江汉论坛, 2009 (5).

[24]岳谦厚. “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之考察[J]. 社会科学理论, 2009 (1).

[25]秦昊扬.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及社团与政党——另一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9 (3).

[26]徐木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类型与功能的历史考察[J]. 北京党史, 2009, (3).

[27]欧阳哲生. 《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 1920—1921 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J]. 历史研究, 2009, (3).

[28]曹小娟. 昙花一现: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运动——以《新社会》旬刊为中心[J]. 社会科学家, 2009, (8).

[29]刘人锋. 《新妇女》与“新妇女”——五四运动时期《新妇女》关于妇女问题的探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3).

[30]赵曜. “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和历史地位[J]. 科学社会主义, 2009

[31]霍海丹.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6).

[32]李蓉.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6).

[33]沙健孙.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J]. 高校理论战线, 2009 (4).

[34]李东朗. 五四运动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6).

[35]齐卫平. 五四运动在思想解放层面上显示的历史意义[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9

[36]王续添. 五四: 建构民族主义与凸显社会转型[J]. 史学月刊, 2009 (5).

[37]左玉河. 五四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J]. 史学月刊, 2009 (5).

[38]张静如. 五四散论[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5).

[39]冯天瑜. 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反思[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7).

[40]李新宇. 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J]. 齐鲁学刊, 2009 (3).

[41]陈平原. 南方都市报, 2008—11—14 (11).

[42]宋剑华. 五四与传统: 我们“成功”地“断裂”了吗? ——兼与陈平原教授的论点进行商榷[J]. 理论与创作, 2009 (3).

[43]资中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代意义[J]. 晚霞, 2009 (10).

[44]侯且岸. 思想革命: 对五四运动本质和意义的省思[J]. 北京党史, 2009 (3).

[45]许苏民. “五四”新文化人的学术建树及其局限性——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J]. 天津社会科学, 2009 (4).

[46]张耀杰. “五四”当事人的争议与反思[J]. 粤海风, 2009 (3).

(责任编辑: 赵广平)